

# 学术动态

## 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东北亚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术研讨会纪要

王 涛 付 琳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2013年8月17日，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办、吉林省文物局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办的“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东北亚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开幕仪式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主持，吉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徐正考教授、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兼省文物局局长金旭东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教授以及韩国青铜器学会会长安在皓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方文物杂志社、山东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美国匹兹堡大学，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新西伯利亚州立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日本龙谷大学、东京大学、国学院大学，韩国釜山大学、东国大学、庆熙大学、全南大学、檀国大学，蒙古国立大学等国内外33个科研院所及相关单位的6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东北亚地区的重要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社会复杂化进程、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演进与互动、东北亚与欧亚草原及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等多个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最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林沄先生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对主要议题进行了点评，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本次研讨会以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吉林大学林沄教授和北京大

学李水城教授分别做了题为《鸭绿江、图们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和《环球视野下的中国盐业考古》的主题报告。其他与会学者根据提交论文内容分为A、B两组,共作学术报告35场。

## 一、考古新发现与相关研究

在35场报告中有16场主要围绕考古新发现及相关研究展开,考古新发现、考古学遗存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研究是其中三个重要内容。

### 1. 考古新发现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吉林大学王立新教授从发掘目的、方法、技术、理念和收获等方面出发,对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2012年度的发掘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平台的建立、遗迹的空间三维建模、遗存的图像数字化处理、平面发掘法的试用、人骨系统采集表的引入、发掘现场学术讨论会的举行,以及开设“名家讲坛”等工作,亮点颇多。该年度对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共发现六个时期的遗存:第一期遗存叠压于昂昂溪文化层之下,它的发现填补了松嫩平原西部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一项重要缺环;第二期遗存与昂昂溪文化有相似之处,初步推定其年代在距今6500~6000年前后;第三期遗存的年代与红山文化大体相当;第四期遗存属于白金宝文化,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第五期遗存属汉书二期文化,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洞室墓的确认和完整揭露为其最重要的收获;第六期遗存属辽金时期。

蒙古国立大学图门(Tumen Dashtseveg)教授介绍了近年来蒙古国东南部苏赫巴托尔省德勒格汗山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新收获,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时期、契丹时期以及蒙古时期的遗存。其中乌兰珠汗、阿德吉恩河和布勒吉恩-额赫山谷的三个青铜时代墓地中所有墓葬的外部结构均较相似,墓地通常是由3~8个墓葬成组或成排被围在一个石头圈内,每座墓葬均为方形石质结构,之间都保持着30~50厘米的间距。人骨的<sup>14</sup>C测年结果显示为公元前1400~前1300年。通过与蒙古国东、南部现已知石板墓和几何形墓葬的比较,她认为这类新发现墓葬在内、外结构和埋葬习俗以及随葬品方面均与之有明显的不同。

### 2. 考古遗存研究主要包括对遗迹、遗物两个方面的综合或个案研究,并以此讨论相关的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认知史等问题

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根据欧、美、非洲以及东亚的日本、菲律宾等地已知盐业遗址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学材料,总结出制盐遗址的五个特点:①有盐卤资源;②遗址堆积深厚;③遗物器类单一,制作较粗糙,造型共性大,均为大口、圜底、尖圜底或尖底,不见或少见日常生活用具等;④遗物大多为一次性使用,故耗损巨大;⑤遗物容积较为

接近, 标准化趋势明显。据以上特点在中国境内以长江三峡和鲁北地区作为盐业考古的田野实践区域, 重建了这两个区域的制盐历史, 对专业化生产及制盐业内部生产组织有了一定了解, 对制盐产业和相关的商贸活动对于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过程也有所探究。但他也指出还有诸多谜团有待破解, 如早期的制盐工艺和技术流程是怎样的? 如何复原考古发现的作坊遗迹? 东周时期的制盐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 最后, 李水城教授指出了盐业生产和相关贸易对聚落、人口、阶层、社会、城市等方面的重要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对庙子沟遗址进行了全面分析, 认为庙子沟遗址所处的黄旗海地区在仰韶时代晚期已进入文化发展的繁荣期, 其社会已经脱离母系氏族社会的束缚, 可能已经跨入父权制下的以家族和家庭为主体的对偶婚制氏族家庭阶段。其经济形态以农业经济为主, 兼有狩猎、家畜饲养和捕捞、采集业。在排除了水灾、火灾的可能性以后, 他推测庙子沟聚落的废弃很可能是由瘟疫和饥荒造成的。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州立大学瓦列诺夫 (Varenov Andrey) 博士对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的鹿石遗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鹿石的原型应该具备圆形、易保存、具有拟人化的特征, 此外其所属的文化传统也应具有雕刻技艺, 且注重陶器生产, 因为陶器的圆柱形或锥形腹面与鹿石形态相近, 而陶器的装饰方式或能为鹿石所借鉴。据此, 他将鹿石的原型锁定在赵宝沟文化的陶尊之上, 并指出类似陶器上的猛禽、带翼鹿和猪头龙的图案与蒙古—外贝加尔类型的鹿石图案相似, 而整个陶尊纹饰的构图正是对赵宝沟文化社群宇宙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展现。他认为鹿石同样是基于古人对自然与社群关系的认识构拟而成的, 并指出赵宝沟文化的石雕以及半山、马厂文化的人形陶器都表现为女性, 而鹿石则是男性战士的象征, 这种转变可能反映了母系社会被替代的过程。

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教授就石钺的出现和发展进行了研究, 认为石钺是由石斧演变而来, 并通过其外形体现出军事统帅权或惩罚功能。他认定石钺出现于仰韶文化的较早阶段, 进入历史时期后, 石钺的统治权象征意义在中原地区逐渐被铜钺、铜戚所代替。而在东北亚地区, 则被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青铜、石质器物所取代。

日本国学院大学内田宏美博士就蒙古国复合弓的制作方法进行了细致调查, 弄清了蒙古弓的结构、制弓材料的获取以及制作流程。通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发现, 东北亚地区弓的特征是在弓的尖端装有骨角质的弓弭。而这种弓弭与当代蒙古国复合弓的弓弭形态完全相同, 从而证明东北亚地区复合弓制作技术自青铜器时代以来未曾中断。

韩国庆熙大学姜仁旭教授通过对中国北方及其周边地区出土花格剑的形制分析, 指出匕首型的整体形态虽与草原地区的铜剑相似, 但西伯利亚草原却未见与中国所出相似的表面施纹者。他推测花格剑的起源与中国北方西周时期流行的直刃式卡拉苏克青铜剑及商代晚期明器中的匕首式礼器相关, 并认为这类铜剑在中国北方以及中亚、西亚等地的互见说明了区域间存在着文化与人群的交流。

韩国全南大学赵镇先教授对中国东北、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出土的多纽铜镜进行了类型学和分布地域的考察。他认为多纽镜最早在中国东北地区出现, 经朝鲜半岛波及

日本列岛,而辽东地区多组粗纹镜中的凹面镜则是受韩半岛多组精纹镜的影响。关于“中国东北地区为什么没有出现多组精纹镜”的问题,他认为与铸造时使用范模材质的不同有关,多组精纹镜使用的是陶范即砂型模,而多组粗纹镜使用的是石范。

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田立坤研究员对辽西地区出土的先秦时期车马器进行了全面梳理,他认为该区先秦马具与马车分别属于魏营子文化、十二台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井沟子文化和五道河子遗存,通过分析马衔与马镳组合方式和使用方式,指出这些文化中的马具或车器虽与中原存在差异,但还都属于同一系统,辽西地区的车马器是在魏营子文化时期受到中原影响而出现的。

内蒙古大学孙璐博士将研究的区域选定在朝鲜半岛,她通过对该区出土车马器年代和种类的考证,认为朝鲜半岛北部的车马器应该是通过乐浪郡传入的,并受到了汉代卤簿制度的影响。

### 3. 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是东北亚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跨界研究的基础

吉林大学林沅教授分别梳理了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指出鸭绿江流域的小珠山下、中层文化以及三堂一期文化与朝鲜平安北道同期的一些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图们江流域的迎花南山类型、兴城下层文化、金谷文化与朝鲜境内的西浦项、罗津、龙坪里,俄罗斯境内的札伊桑诺夫卡、格沃兹杰沃等遗存文化性质相近;乌苏里江流域的刀背山类型、新开流文化以及俄境内的卢札诺夫索普卡、鲁德纳亚文化的内涵相似。通过比较区域内文化内涵,他指出中国东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大规模的人群移动;鸭绿江、图们江、乌苏里江流域各有其特殊的压印纹陶传统;新石器时代有多支文化进入朝鲜半岛,其文化呈复杂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青春研究员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析,将东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早、中、晚和末期,并阐述了各期的特点和年代范围。通过各区间文化的对比,他认为在东北亚发现的距今1万年以前的平底陶器与中国南方的圜底器分属不同系列,至于谁影响了谁,抑或各自独立起源,还有待探索。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各区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其中以中国的兴隆洼文化最为强势。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新石器时代末期,各区交流频繁,螺旋纹、雷纹、几何纹等到处共见,孕育了青铜时代的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索秀芬研究员将兴隆洼文化划分为查海、白音长汗和东寨三个地方类型,每一类型又分为三期,总结了各类型的分布区域及文化特征。她认为兴隆洼文化的三个地方类型奠定了燕山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格局。

吉林大学杜战伟博士通过比较水洞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陶器和纹饰,指出它们是辽东地区相继发展起来的三种考古学文化,具有内在的渊源和传

承关系,彼此可以构成一个连续发展的文化链条,属于一脉相承的文化系统,即水洞下层文化系统。

日本东京大学石川岳彦博士对东周燕国青铜容器和随葬陶器进行分期研究,分别将青铜容器、墓葬陶器划分为四期和五期,其中青铜容器第一期与陶器第一期相当,年代在公元前500年以前;青铜容器第二、三期与陶器第二期相当,年代在公元前500~前400年;青铜容器第四期与陶器第三、四、五期相当,年代在公元前400~前200年。通过考察各期文化内涵的变化,勾画出燕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发展过程。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研究员首先根据文献考证出貊人是西周晚期至东汉早期活跃在今医巫闾山东、西两侧古老民族,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强盛。进而根据下辽河流域的郑家洼子文化和大凌河流域的十二台营子类型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指出它们应属于貊人遗存。

## 二、文化交流与传播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考古学研究的另一重要内容,其本质是探寻人群交流的方式、内容及通道等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通过对制玉工艺的分析,认为内蒙古兴隆洼、黑龙江小南山、俄罗斯Chertovy Vorota、日本桑野和大崎、辽宁牛河梁、山东大汶口、浙江河姆渡以及余杭等地相关遗址出土的玉器均采用砂绳切割技术制作,其中以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的年代最早,逐步向南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再到岭南地区,出现该技术的年代逐渐变晚,据此推测玉器砂绳切割技术有着从北向南的传播路线。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根据《管子》“发、朝鲜之文皮”的记载,结合对山东和东北地区、朝鲜半岛诸多先秦遗址出土动物遗骸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指出《管子》所载齐国从海北获取裘裘具有其真实背景。根据胶东半岛相关东周考古遗存的地理分布,他勾勒出齐国对海北的两条交通贸易路线,一是从临淄向东沿胶东半岛北岸至蓬莱、长岛、辽东,二是从临淄向东至即墨(在今平度东南)沿胶东腹地至蓬莱、长岛、辽东。

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提出“辽海民族走廊”的概念,来研究东北地区的文化交流。他指出该走廊是一条不甚典型的民族走廊,其平面是一个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环绕交叉结构,而走廊两侧的地貌屏障大部分是海洋。走廊内的交流通道有陆路和海路两条,其中陆路以辽东郡治襄平(辽阳)为中心,海路自山东半岛北部的北海、齐、东莱诸郡出海。此概念的提出串联起“两个海”和“三个半岛”,有助于加深对东北文化区性质和内涵的理解,并能更好地解释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民族关系的格局。

韩国檀国大学李钟洙博士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详细勾勒了扶余与中原地区、东北的高句丽、挹娄、东沃沮、北沃沮及北方地区的橐离国、慕容鲜卑之间往来的多条交通路线。

吉林大学赵俊杰博士通过对关马山M1陶器组合的文化因素分析,确认该墓的主体为宝山文化,同时受到黄鱼圈珠山M1类型遗存的影响。根据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他认为该墓的发现填补了战国晚期宝山文化先民北上的重要节点,进而勾勒出了人群从辽北、吉南地区出发,自南至北穿越长春地区中南部到达农安、德惠一带的移动路径,而这一路径也是各民族人群移动与文化交流的走廊。

韩国釜山大学裴真晟博士对韩半岛西北地区丰龙洞石棺葬的形制、随葬品等文化内涵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其中既有中国东北的文化特征,又有韩半岛的文化因素,鉴于所处清川江流域的地理位置,推测该区域是东北文化圈与韩半岛文化圈的过渡地带。

吉林大学杨建华教授考察了贝加尔地区青铜时代至早铁器时代青铜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指出贝加尔地区与中国北方这种南北向的通道延续了上千年。大量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因素通过此通道到达贝加尔地区,并同当地传统文化一道铸就了东部草原的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

吉林大学潘玲教授的研究指出,与战秦之际相比,西汉时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地区文化间的交流显得十分薄弱,两地互见的器物很少。其原因在于,匈奴对北方草原的控制切断了中国北方、中原文化与欧亚草原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的变化过程正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武帝前期中原政权与中国北方民族政治关系在考古遗存方面的生动反映。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两地区中断百年的文化交流重新开始,南亚、中亚、中东地区的文化被带入中原,汉文化也借此通道远播开去。

### 三、理论与技术

在本次研讨会中,学者们还介绍并讨论了不少新的考古学理念和研究方法。

吉林大学朱永刚教授注意到新发现的西梁类型、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很难纳入辽西区已确认的文化系统中去,他提出将辽西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框架解构成内核和边缘的双重构造模式,即主体文化为内核、非主体文化为边缘。具体地说,在辽西区除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这个主体文化序列外,还存在着西梁类型—富河文化—哈民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这样的非主体文化序列。同时也指出这种边缘效应的特点是:位于文化区之间,文化谱系多元、复杂,文化带不稳定;受周边文化影响的过程可能是间断的、渐进的、缺乏谱系的连贯性;表现出与核心文化渐行渐远的“离心运动”。

美国匹兹堡大学周南(Robert D. Drennan)教授分别从遗址分布、集群状况、人口数量、聚落等方面对比了大凌河上游和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遗存。他认为,纵观整个文化序列,两个地区的区域组织十分相似,一些小型政体代表了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的一体化。在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口数量更大,社群数量更多。而在大凌河上游地区,红山时期的人口数量更大,公共性建筑更多。夏家店下层时期,

赤峰地区的人口数量更多,聚落冲突也更多。而大凌河上游的人口增长更快,城镇发展也更加迅速。在每一个连续的文化中,社群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系,赤峰地区和大凌河上游地区最强有力的发展出现在不同的时段。

俄罗斯科学院米尼亚耶夫(Sergey Miniaev)教授介绍了一种由该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室开发的,适用于图像识别系统的多光偏振方法。它可用于测定羊毛、羽毛、毛发、植物纤维和其他生物或考古样品特有的自然属性。他们利用此方法创立了动物毛发以及植物和动物纤维标准的光偏振数据库,以对比古代样品。他展示了通过此方法对诺言乌拉匈奴墓地6号冢出土的毛毡地毯和“羊毛覆盖物”的研究,发现其为驼毛制品,在个别图案部分会使用马毛。

吉林大学陈胜前副教授根据磨制石器功能分析来探索史前农业技术。他以兴隆洼文化典型遗址、白音长汗、大山前遗址中出土的石锄、石铲、石刀等农业工具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对比发现,用作铲与用作锄的石器在刃缘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且二者在农业活动中也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此外,他认为人们耕作的区域是从山坡不断走向河谷的;从粗放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开始是只有简单的破土,赵宝沟与红山时期开始深耕,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之时,人们挖地、耘土、灌溉、中耕,原始农业的耕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吉林大学段天璟副教授评述了西方考古界常用来研究聚落形态的“等级-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办法。他还介绍了运用统计学方法模拟数据范围的K-检验和A值分析等判读等级-规模曲线结论的方法。

除以上介绍的理念和方法外,传统的科技考古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部分。传统的科技考古研究一般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就某一问题进行验证性研究;另一种是根据具体的材料进行探索性研究,此次会议两种研究均有所涉及。

吉林大学汤卓炜教授对东北中西地区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考古遗址的分布与环境背景(包括高程、坡度、坡向、河谷缓冲区、地貌、土壤、地质条件)以及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东北地区中西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与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

吉林大学陈全家教授等对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观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住于该遗址的先民所利用的动物资源丰富,种类多样,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根据动物群的数量比和种类推断该遗址的生业模式是以狩猎经济为主,兼具渔猎经济,而自然环境为森林草原景观。

吉林大学蔡大伟副教授的研究认为,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见T2黄牛应为近东地区向东传播所致,起源于近东的T3黄牛在距今4000年前已经扩散到中国北方地区,并到达了中原,而南方的瘤牛尚未进入北方。二里头遗址黄牛为中国现有黄牛奠定了稳定的基因。

吉林大学周亚威博士介绍了对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出土人骨的古人口学研究,研究

表明该群体平均死亡年龄为26.8岁,死亡高峰期集中在未成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无老年期个体。此外,吉林大学张野硕士对哈民忙哈遗址出土人骨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方法、流程以及设想为大家做了介绍。

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正在走向世界,以研究中国北方与东北亚诸地区古代社会文化及其相互关系为内容的东北亚考古这一国际性学术课题正在全面开展。本次会议积极构建一个开放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平台,与会学者齐聚一堂,彼此分享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有力推动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进程。

注:整理材料来自与会学者提交的摘要、演讲PPT以及会场记录,未经报告者确认。

## **The Conference Summary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Social Changes: The Archaeology of Neolithic Age and Bronze Age of Northeast Asia***

Wang Tao   Fu Lin

A conference 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Social Changes: The Archaeology of Neolithic Age and Bronze Age of Northeast Asia* hosted by Frontie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Jilin University had been held in Changchun city on August 17th and 18th, 2013. More than 60 scholars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d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d received 37 research papers which involve new archaeological finds,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cultural exchange, archae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so on. Each presentation entailed extensive concentration as well as enthusiastic discussion and Senior Professor Lin Yun summarized the conference in the end.